浅谈保护观念指导下博物馆文物利用方法

曾焱焱

重庆自然博物馆

DOI:10.12238/pe.v3i2.12435

[摘要] 博物馆文物的保护与利用始终存在动态平衡的实践难题。本文以保护观念为理论基点,系统探讨文物利用的创新路径。研究指出,传统保护模式存在绝对化倾向,导致文物利用陷入高强度开发或过度封存的两极困境;当前利用手段受制于技术表层化应用与管理机制滞后,也难以释放文物的多维价值。基于此,论文提出保护观念指导下的四维解决框架:通过建立动态评估体系重构科学利用认知,运用分级策略实现文物价值转化,依托标准化制度构建全流程管理闭环,借助叙事重构深化教育功能。研究强调,文物保护与利用具有协同共生性,唯有将利用行为纳入文物生命周期管理,方能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传承。

[关键词] 博物馆; 文物保护; 文物利用

中图分类号: G260 **文献标识码:** A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Methods of Utilizing Cultural Relics in Museum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rotection Concept

Yanyao Zeng

Chongqing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bstract] There has always been a practical problem of dynamic balance i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in museums. Taking the protection concept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innovative paths for the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The research points out that there is an absolutist tendency in the traditional protection mode, which leads to the dilemma that the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falls into two extremes: high-intensity development or excessive sealing. At present, the utilization means are restricted by the superficial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 lagging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it is also difficult to unleash the multi-dimensional value of cultural relic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a four-dimensional solution framework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rotection concept: reconstruct the cognition of scientific utilization by establishing a dynamic evaluation system, realize the valu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through a hierarchical strategy, construct a full-process management closed loop relying on standardized systems, and deepen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by means of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The research emphasizes that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re symbiotic and collaborative. Only by incorporating the utilization behavior into the life cycle management of cultural relics can the sustainable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heritage be achieved.

[Key words] Museum;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引言

全球化浪潮与数字化革命重塑着博物馆的社会职能,文物利用已从单纯的学术研究延伸至文化传播、公众教育等多重领域。然而,文物保护与利用的固有张力在实践层面持续发酵,过度强调物质保存易使文物沦为“文化标本”,激进利用则可能导致不可逆损伤^[1]。这种矛盾本质源于对文物价值认知的片面性——未能将文物视为兼具物质性与文化性的生命体。当代博物

馆面临着双重挑战:既要应对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参与需求,又需遵循文物保护的科学规律。现实困境集中体现为技术应用的形式化倾向,如数字化展示停留于视觉复制而缺乏知识解构;管理机制的碎片化状态,致使保护标准与利用需求难以有效对接;教育功能的程式化开发现象,削弱了文物作为文化媒介的传播效力。这些问题的破解,亟需在保护观念框架下构建系统化解决方案。

1 保护观念的内涵与博物馆文物的价值

1.1 保护观念的内涵

保护观念作为文化遗产领域的核心理念,本质上是人类对历史遗存认知深化的产物。其内涵可追溯至“修旧如旧”的传统修复思想^[2],而后伴随现代科技介入逐渐演变为系统性保护理论。当代的保护观念其实已突破了单纯的“维持物质形态稳定”范畴,转而强调预防性保护与动态平衡原则,即在最小干预基础上建立风险预警机制,通过环境监测、病害分析等技术手段延长文物生命周期。与此同时,保护观念还包含文化延续性的深层诉求——通过保护行为实现历史信息的完整传递,使文物不仅作为物质实体存在,更成为承载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这种兼具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双重属性,构成了现代保护观念区别于传统修复模式的核心特征。

1.2 博物馆文物的价值

1.2.1 历史价值

博物馆文物的历史价值根植于其作为历史进程见证物的本质属性。每一件文物都是特定时空坐标中人类活动的具象化呈现,其物质形态与使用痕迹构成解读历史的“三维档案”。例如青铜器铭文中的文字符号、瓷器釉面中的窑烧痕迹,皆可还原古代社会的生产技术、经济形态与制度规范。这种价值具有不可复制性,任何仿制品都无法替代原始文物所携带的历史信息链,其真实性特征使文物成为校正历史叙述的重要实证依据。

1.2.2 艺术价值

艺术价值体现于文物承载的审美创造与工艺智慧。古代匠人通过造型设计、纹饰布局与材料运用,将抽象的文化观念转化为具有形式美感的物质实体。商周青铜器的狞厉纹饰映射出原始宗教的威严,宋代瓷器的单色釉则彰显文人雅士的审美趣味。这种价值具有超越时空的感染力,其形式语言不仅反映特定时代的艺术范式,更通过造型元素的解构重组持续影响着现代艺术创作,形成传统与现代的美学对话。

1.2.3 科学价值

文物作为古代科技文明的物质载体,其科学价值体现在技术实证与知识解码层面。战国编钟的声学结构、汉代透光铜镜的合金配比、元代水运仪象台的机械装置,均蕴含着超越文字记载的技术密码^[3]。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文物可提供古代科技发展的第一手证据,其蕴含的生态智慧与创新思维对于现代科技发展具有启示意义,例如传统建筑中的木构榫卯技术对当代抗震设计的借鉴价值等。

1.2.4 社会教育价值

博物馆通过文物展示构建起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场域,观众在器物解读中形成对文化根源的认同感。这种价值实现依赖于文物的“二次阐释”——通过叙事重构将专业考古信息转化为大众可理解的文化符号,使文物成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媒介。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文物承载的地方性知识可有效增强文化多样性认知,其教育功能已从单纯的知识传递扩展至价值观塑造层面。

2 博物馆文物利用现状问题分析

2.1 文物保护与利用的平衡

当前博物馆文物利用实践中,保护与利用的张力关系始终未能形成有效协同机制。部分机构为追求短期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将文物作为文化消费符号进行高强度开发,例如频繁外借巡展导致环境突变引发的材质劣化,灯光设备过度照射造成的颜料褪色等问题屡见不鲜。与之相对,另一些博物馆则陷入“绝对保护主义”误区^[4],将文物长期封存于库房,致使公众接触文物的权利与博物馆公共属性形成实质冲突。这种非此即彼的操作模式背后,暴露出对文物价值认知的割裂化倾向——未能认识到合理利用本身即是保护观念的延伸。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技术支撑体系的不完善,多数机构缺乏科学评估文物利用风险阈值的量化模型,既无法精准判断文物参与展示、研究的承载限度,也难以构建动态调节的保护预案,最终导致保护与利用沦为非此即彼的“单选题”。

2.2 利用手段相对单一

博物馆文物利用方式仍依赖于较为传统的路径,主要表现为“实体展览+图文解说”的固化模式。尽管数字化技术已在行业内广泛渗透,但其应用多停留于虚拟展厅、语音播报等表层呈现,尚未形成文物信息深度挖掘与跨媒介转换的有效机制。例如青铜器纹饰的数字化展示往往止步于视觉还原,未能结合铸造工艺、纹样演变进行交互式知识解构;书画类文物的高清影像传播也鲜少关联笔法特征、装裱技艺等专业维度。这种技术工具与学术内涵的脱节,使得创新手段沦为吸引眼球的装饰性元素。此外,教育功能开发同样面临同质化困境,社教活动多集中于手工复制、讲座导览等常规形式,未能基于文物特质设计分众化体验项目。尤其对文物蕴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如传统制作技艺、古代生活方式等活态文化因子的转化利用明显不足,导致文物利用停留在“物”的展示层面,难以触发观众对文化脉络的系统性认知^[5]。

2.3 管理机制不健全

现行文物利用管理体系存在明显的制度性滞后,突出表现为权责界定模糊与标准体系缺失。多数博物馆尚未建立专门的文物利用评估委员会,日常决策多依赖行政管理人员经验判断,致使文物利用方案缺乏跨学科论证支撑。部门协同机制的不畅导致保护部门侧重风险控制、社教部门强调公众参与、研究部门专注学术价值,三方诉求难以在具体实践中达成共识。资金分配机制更凸显结构性矛盾,财政拨款多向硬件建设倾斜,用于文物预防性保护、利用技术研发的专项资金比例严重失衡。制度空白在基层博物馆尤为显著,缺乏专业人才的机构往往将文物利用等同于简单陈列,既无能力开展文物健康状态监测,也无能力构建利用效果评估反馈系统^[6]。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行业监管体系的不完备,现有《博物馆条例》对文物利用的规范停留在原则性表述,既未明确不同等级文物的利用强度标准,也未建立全国统一的文物利用数据追踪平台,导致监管效力在操作层面大打折扣。

3 保护观念指导下博物馆文物利用方法

3.1 建立科学的文物利用观念

科学的文物利用观念需以动态保护理论为根基, 重构“保护即利用”的认知框架。这一观念的确立要求突破将保护与利用割裂的二元思维, 转而将文物利用视为保护行为的有机延伸。具体实践中, 需构建基于文物材质特性与保存状态的动态评估体系, 通过光谱分析、微环境监测等技术手段建立文物健康档案, 为每件文物定制差异化的利用阈值。例如纸质文物可依据纤维老化程度设定年度曝光时长, 金属文物则根据锈蚀状态调整展陈环境参数。观念革新还需引入“预防性利用”概念, 即在风险可控范围内, 通过适度利用激活文物的文化传播功能——如利用高精度复制品承担巡展压力, 原物则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实现云端共享。这种观念转变本质上是对文物生命周期的重新诠释: 将利用行为纳入文物存续的全过程管理, 使文物保护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干预, 最终实现“以用促保”的良性循环。

3.2 制定合理的文物利用策略

合理的利用应遵循“分层次、多维化、可持续”原则, 形成梯度式开发体系。针对珍贵易损文物, 可采用“本体保护—信息转化—价值延伸”三级利用模式^[7]: 本体保护层严格限制实体接触, 通过非接触式扫描建立数字档案; 信息转化层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复原文物历史场景, 如将汉代织锦纹样转化为动态服饰演变展示; 价值延伸层则提取文物元素进行文创衍生开发, 如依据青铜器铭文设计汉字演变教育游戏。对普通文物可实施“活态传承计划”, 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活化利用, 例如将古代陶瓷烧制技艺融入现代陶艺工作坊, 使静态展品转化为可体验的生产流程。策略制定还需注重时空维度调节, 建立“展陈周期轮换制”与“地域文化适配机制”, 避免单一文物过度曝光, 同时根据巡展地文化特征调整阐释视角, 使文物价值阐释兼具学术深度与地域亲和力。

3.3 完善博物馆文物利用管理制度

制度建设的核心在于构建覆盖全流程的标准化管理体系。需成立跨学科的文物利用评估委员会, 整合文物保护、艺术史、材料科学等多领域专家, 建立包含材质稳定性、历史重要性、修复史等因子的量化评估模型。管理流程上应实施“三阶管控”: 利用前进行文物承载能力诊断并制定应急预案, 利用中采用物联网技术实时监控温湿度、震动等参数, 利用后开展为期三年的追踪监测以评估长期影响^[8]。资金管理机制方面则需设立专项利用基金, 按照文物等级实行差异化拨款, 固定其中一部分强制用于后续保护研究。并建立全国文物利用数据库, 实现各馆利用记录的可视化分析与风险预警。对于基层博物馆, 需推行“1+N”帮扶制度, 由省级馆牵头建立专家巡回指导机制, 确保管理标准的下沉落实。

3.4 增强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教育功能的深化需构建“文物—叙事—体验”三位一体的

传播体系。在内容构建层面, 要突破传统年代叙事框架, 建立“主题式知识图谱”——例如以唐代金银器为原点, 辐射连接丝绸之路贸易、中亚工艺交流、唐代社会审美等关联知识点, 形成立体化认知网络^[9]。展示方式上推行“参与式阐释”, 设计可操作的模拟考古探方、可穿戴的纹样投影设备, 使观众在互动中理解文物背后的技术逻辑。教育项目开发需建立分众化课程体系: 面向青少年设计“文物拼图认知法”, 通过碎片复原过程培养历史思维; 针对高校群体开发“微观观察工作坊”, 借助电子显微镜观察陶瓷胎体结构; 社区教育则可推行“文物记忆工坊”, 邀请观众口述家族传承器物故事。更需重视教育效果的持续延伸, 通过建立数字教育资源库、开发馆校联动的文物主题通识课程, 使博物馆教育突破时空限制, 真正成为终身教育体系的关键节点。

4 结语

保护观念指导下的文物利用本质上是对文化遗产生命力的重新激活。研究表明, 文物的可持续利用需突破“保护优先”或“利用至上”的二元对立, 转而建立基于风险评估的动态平衡机制。通过构建科学认知体系, 文物利用得以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驱动; 分级策略的实施使不同类型文物实现价值释放的最优解; 标准化管理制度为保护与利用的协同提供制度保障; 教育功能的创新则打通了学术研究与公众认知的转化通道。唯有持续推动保护观念与利用实践的创新融合, 方能使博物馆文物真正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纽带, 在当代社会焕发持久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陆建辉. 博物馆文物藏品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开展策略[J]. 中国文房四宝, 2024(3): 0182-0183.
- [2] 张新红. 保护观念视域下博物馆文物藏品的利用[J]. 美化生活, 2023(31): 190-192.
- [3] 牛晓龙. 博物馆文物陈列与保护研究[J]. 黑龙江史志, 2024(4): 135-137.
- [4] 倪旭. 革命纪念馆档案数字化保护与利用——以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为例[J]. 数字技术与应用, 2024, 42(6): 198-200.
- [5] 李鸿. 浅谈博物馆馆藏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1(21): 91-93.
- [6] 蒋海丰. 预防性保护理念下博物馆文物保护方法——以诸暨市博物馆为例[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1(24): 128-130.
- [7] 薛博超. 基层博物馆文物保护与利用的思考及策略探讨[J]. 文化产业, 2021(33): 91-93.
- [8] 岳巧思, 张辉. 论数字博物馆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中的应用——以陕西黄河流域为例[J]. 艺术科技, 2022, 35(12): 67-69.
- [9] 伍洲. 博物馆革命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探索与实践——以广东省博物馆为例[J]. 科学教育与博物馆, 2023, 9(3): 86-93.

作者简介:

曾焱焱(1983--), 男, 汉族, 重庆市人, 本科, 助理馆员, 研究方向: 文物保护。